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兵法》战争智慧研究专题

## 《孙子兵法·作战篇》主旨考论

齐泽强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关于《孙子兵法·作战篇》,自三国时曹操注其篇题始,后世注家多以“算其费”的战备问题为其主旨。但孙子此篇主旨实为对“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方针的阐释与确立。通过对篇题“作战”二字进行考释与训诂,钩沉出其具有“制作战策”或“制定战略”的原始义涵。因循在逻辑理径上探寻其篇旨,厘清了其上论“不贵久”、中言“知利害”、下述“兵贵胜”的主旨思想。在准确诠释孙子“兵贵胜,不贵久”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与毛泽东为抗日战争提出的“抗日战争是持久作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战略方针相互映照,证明了《孙子兵法·作战篇》所创立的战争方略的全局性与指导性。

**关键词:**《孙子兵法》;《作战篇》;战略方针;兵贵胜;不贵久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cnki.1673-2618.2024.01.001

《孙子兵法》作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特别是军事思想文化的瑰宝,被我国乃至世界许多军事家奉为圣典,它所揭示的用兵之法、制胜之道,至今散发出真理的光辉,并不断得以广泛传播和普遍运用。其中,《孙子兵法·作战篇》所提出的“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方针,就是着眼于“为客之道”<sup>[1]196</sup>的攻势战争,基于“丘牛大车”<sup>[1]28</sup>的农耕经济,研究并制定的“胜敌益强”<sup>[1]30</sup>的战争之策。因此,深入研究和分析孙子制定战略方针的思想方法,对于创新新时代军事战略指导,科学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的建设和运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 一、篇题“作战”义涵的训释

“作战”一词,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唯《作战篇》篇题独见。关于古时篇题有两种:一种是代号性的篇题。章太炎在《文学说例》一文中就讲:“前世著述,其篇题多无义例。《和氏》《盗

跖》,以人名作为符号;《马蹄》《骈拇》,以章首为揭橥。”<sup>[2]409</sup>意思是说,古代的文章,题目大多不是表明文章思想内容的。比如,出自《韩非子》的《和氏》一文和出自《庄子》的《盗跖》一文,这两篇文章都是以文章中的人物名字来作为篇名;而出自《庄子》的《马蹄》和《骈拇》两篇文章,则都是拿出文章中的头两个字来作为篇名。所以,古文类似的篇题,只是一种代表该篇文章的符号或标志。另一种则是主旨性的篇题。如《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题,就属于这种,它既是对文章主旨的命名,又是对文章中心思想的高度概括。这就像清代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中所说的“题有题眼,文有文眼”<sup>[3]183</sup>,对文章具有画龙点睛、点铁成金的效果。所以,搞清“作战”这两个字的本根之义,对于准确把握《孙子兵法·作战篇》的主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界形成的共识是,此二字不同于今天军事术语的“作战”,现代“作战”是指“武装力量

收稿日期:2023-10-12

作者简介:齐泽强(1965—),男,山西定襄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军事思想与兵种战术的教学与研究。

E-mail:740071662@qq.com

攻击或抗击敌方的行动”<sup>[4]63</sup>，而古时“作战”并非指一般的战阵之事。《广雅·释诂》云：“作，始也。”故众多注家普遍认为，“作”是“开始”的意思，还常引《老子》“天下大事，必作于细”<sup>[5]159</sup>来说明。“作”为“始”义，因此，“作战”即始战，是战争准备的意思<sup>[6]17</sup>。古如张预注曰：“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sup>[7]28</sup>今如黄朴民注曰：“作战，始战，即做战争准备。这里不是通常意义的战阵交锋。作，始、开始的意思，同‘乍’。”<sup>[8]54</sup>与此一脉相通，然稍有异见者，如吴如嵩的注释“从字面上来看，这个‘作’是开始的意思，‘战’是战争，如果直译为开始进行战争，显然不妥。从内容上看，它论述的是包括战争经济动员在内的军事后勤问题”<sup>[9]23</sup>。又如付朝注曰：“‘作战’即‘战争的开始和战争的进行’，讲的是战争准备阶段的投入和战争开始以后的战争消耗问题。”<sup>[10]93</sup>凡此种种，上述所释基本代表了古今注家的主流认识。

此外，还有一些注家的解释虽语焉不详，却颇具异趣，尤值深思与根究。如赵本学注曰：“作，造也，庙堂既有成算，然后计程论费起造战事也。”<sup>[11]14</sup>“起造战事”是何谓？如施子美注曰：“作战者，所以作之而使战也。”<sup>[12]37</sup>“作之而使战”为何意？又如郭化若注曰：“本篇以‘作战’命名；紧接‘计篇’论述战前计划之后，再论作战问题（古代战争不分战役、战斗，也不论大战小战统称为作战）。”<sup>[12]37</sup>“作战问题”又何指？再如陈启天注曰：“本篇主旨，乃论攻势战争贵速胜，不贵持久。近代以速战速决为攻势战争之战斗原则，正与本篇之旨相合。”<sup>[12]37</sup>“本篇主旨，乃论攻势战争贵速胜，不贵持久”与篇题“作战”究竟何干？欲回答这些问题，最首要、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对“作战”二字深入考据和达诂。

《论语·述而》讲：“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sup>[13]78</sup>此乃孔子的自我评价，私下把自己比作三代时期的长寿始祖彭祖，唯执“信而好古”，但求“述而不作”。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释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sup>[14]93</sup>那么，究竟什么是“述”，什么又是“作”，二者之于孔子又具有何等的社会意义呢？清代思想家、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上》中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

圣，而立教之为师。”<sup>[15]174</sup>章公意思是说，周公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为永世“立制”；孔子所以为至圣先师，就在于他为万世“立教”。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立制者莫过于周公，而立教者莫过于孔子。所以说，尽管章学诚只把周公的“立制”称作“制作”，但其实无论是周公的“立制”，还是孔子的“立教”，完全都属于“创立”“创始”之举，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作”。无独有偶，对于孔子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早就评价说：“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sup>[16]435</sup>。显然，在太史公看来，孔子的“述而不作”，实际上是“述而有作”，其“作”亦表现在，虽非为后世社会立制，却是为后人精神立法，以至于成为后人遵从的治学楷模。由是观之，“作”自古就有“创始”“制作”之义，自然也可引申为“立制”“立法”的意思。

故此，笔者认为，孙子“作战”之“作”，乃孔子“述而不作”之“作”，为“创始”“创立”之义，可引申为“制作”“制定”之义。“作战”之“战”，《左传·庄公十一年》有云“皆陈曰战”<sup>[17]39</sup>，《说文解字》亦云“战，斗也”，本义指两军“对阵”“对战”，可引申为“战策”“战略”之义。“作战”属动宾结构的名词，其结构词性相类于西周“制礼作乐”一词。“制礼作乐”是指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相传由周公制定。“礼”强调“别”，即所谓“尊尊”；“乐”强调“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规定。西周的礼乐制度是周王朝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总体谋划，是当时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和文明，是西周贵族阶层赖以统治国家的上层建筑。因此，“制礼作乐”并非顾名思义的制定礼仪、创作乐曲的字面含义，而是逐步演变成的周王朝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是周王朝维护统治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各项典章制度的总称，也是指导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制度和政策。《孙子兵法·作战篇》篇题之“作战”，与“制礼作乐”属同构共类的概念，可训解为“为战立制”“为战立法”，也可引申为“制作战策”之意，它不仅具有制定战略方针、确立作战思想的含义，而且具有依此指导战争、规制战争的意蕴与功能。故而说，周公之“制礼作乐”乃为社会公序良俗立制，孙子之《孙子兵法·作战篇》乃为举师征战夺胜制策。这也正是赵本学“起造战事”、施

子美“作之而使战”和郭化若“再论作战问题”，想说却又没能说明的“作战”二字的含义所在。换言之，“作战”二字正是对陈启天所言“本篇主旨”或“攻势战争贵速胜，不贵持久”的名称规定或概念抽象。综上所述，孙子篇题“作战”的含义当为“制作战策”或“制定战略”之意，《孙子兵法·作战篇》的主要内容则是探讨战争应制定和遵循什么样的作战指导、为什么要制定和遵循这样的战争指导等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制定科学的战略方针，指导战争全局的筹划与行动。然而，上述的考释仅属对“作战”二字词义的辨识，它是否真的具有“制作战策”或“制定战略”的含义，归根结底，唯有《孙子兵法·作战篇》全篇反映的主旨可以明证。

## 二、《孙子兵法·作战篇》主旨的剖析

刘熙载《艺概·文概》说：“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可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募涧’，全仗缰轡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sup>[3]</sup>所谓“明断”即指思想内容表面上的叙述中断，所谓“暗续”即理论思维实际上的逻辑连贯。《孙子兵法》十三篇均是典型的“明断暗续”而“高不可攀”的先秦古文，倘若我们着力研究与探寻其逻辑理路，不难发现它每篇均具有“上、中、下”的文法结构。<sup>[18]75</sup>对于古代文化典籍这一鲜明的文思特点，杨义认为：“这就是中国所谓‘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内中和而外两级，这是中国众多叙事原则的深处潜规则。无中和，两级就会外露崩裂；无两级，中和就会凝固和沉落。中和与两级，二者也是对立统一的，它以两级对立为动力，以中和使审美动力学形成完整的境界”<sup>[19]25</sup>。由是观之，《孙子兵法》诸篇所呈现的这种统一的逻辑结构，已然不只是一种“文法”，而是孙子基于古代“中和”哲学思想精髓之上的研究兵法的方法论。所以说，只有弄懂孙子《孙子兵法·作战篇》的逻辑结构或者说理论思维，才能准确把握其所阐发的主旨思想。

上半部分，尽陈“兵久”之害，阐明了用兵打仗的根本戒律：“不贵久”。古语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子正是把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他开宗明义指出：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开篇就发凡启例，以千驷、千乘、千里、千金、十万等一系列颇具冲击力和震撼力的数据，描摹了一场典型规模的战争对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耗费。

这里，之所以说它是“典型规模的战争”，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古时“凡”字本身就用于表明事物的一般性和典型性。句中“凡”字，古代习称“凡例”，晋朝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注：“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意思是古人一般以“凡”字引出一些带有共性、常性的体制、章法或内容大要。第二，“千乘之国”“带甲十万”乃春秋末期国家实力和战争力量的经典表征。如《论语·先进》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sup>[13]147</sup>孔子此言说明，到了春秋末期，“千乘之国”业已不是什么大国，只能是“摄乎大国之间”的一般实力的国家。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小国称“千乘”、大国称“万乘”的屡见不鲜。如《管子·大匡》曰：“天下之国，带甲十万者不鲜矣。”<sup>[20]15</sup>尽管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但通常还是认为：“把步兵称为‘带甲’，是战国时代的称呼，‘带甲’用到十万，是春秋战国间才开始的现象”<sup>[21]</sup>可见，春秋末期，“带甲”到“十万”的规模，的确是“不鲜矣”，而到了战国时期，“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更多见于典籍之中。第三，无论“千里”还是“千金”均具有客观的实际意义。《春秋·谷梁传》载：“古者，三百步一里，名曰井田。”可见古之“里”，是用脚步量出来的，应该说是概略的、经验的。据《续文献通考》载“周以八尺为步”，“秦以六尺为步”，由于秦汉尺的长度，如商鞅量尺、新莽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都是一尺等于0.231米<sup>[17]95</sup>，由此可以算出周之一里等于1800尺即415.8米，为现代一里500米的83.16%。那么，春秋末期的战争有可能跨越“千里”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例如，孙子所在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无锡），与其敌国越国都城会稽（今浙江绍兴），两地相距约346公里，折算为古代的“里”，约为832里。再如，发生于战国时期的“围魏救赵”，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北）与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两地相距约540公里，折算为古代的“里”，约为1299里。同样，古时

“日费千金”之“金”亦具有两方面的货币意义：一方面，“金”泛指金属，但作为货币意义的“金”，当时主要指青铜；另一方面，先秦“金”是计算货币的单位，“金”有多重，各国不尽统一。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云：“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当时的“千金”约合374公斤的铜。<sup>[20]17</sup>正基于此，我们才说孙子所述车马、士卒、粮秣、用度四大类八个具种，数量或千计或万计的列举分析，具有较强的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是对当时一场典型规模战争费用开支的预算结论。

然而，这里特别需要我们洞悉的是，表面上看孙子是在说明战争耗费甚巨，实际上却在强调战争消耗——“日费千金”。具而言之，他给出的预算结论并非总体的、静态的，而是局部的、动态的，因为他的结论只是“日费千金”，是每天的开支，而不是一场战争总的开支，其实旨在告诉人们两点：一是耗资巨大，二是与日俱增。也就是说，仗多打一天就要多花费“千金”，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战争的开支就越大，这是战争指导者不得不面临与研究的一个严峻问题。所以，何氏注说：“老师费财，智者虑之。”那么，孙子对此又是如何考虑的呢？

继而，孙子顺理成章地研究了“兵久”之害，阐明了三种典型的“兵久”战争类型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一是“胜久”的战争，即所谓“胜久则钝兵挫锐”，获得了胜利但陷于持久的战争，将导致军队的兵锋士气严重受挫。二是“攻城”的战争，即所谓“攻城则力屈”，强攻敌方城池的战争，将导致军队的战斗力消耗殆尽。《孙子兵法·谋攻篇》云：“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橐辘，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仅准备工作就需要半年，攻城属“兵久”作战无疑。三是“久暴师”的战争，即所谓“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但久拖不决的战争，将导致国家的经济风雨飘摇。总的来看，“兵久”的三种战争情形，时间一种比一种长，危害一个比一个大，结局一个比一个糟。他总结归纳了“兵久”带来的危害，之于军“钝兵挫锐”，之于国“屈力殫货”，此乃现实的危害；与此同时，还极有可能带来更可怕的诸侯各国的发难和政治上的连锁反应，“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国将不国，毕力难挽，此乃潜在的危害。要言之，“兵

久”必然导致国“弊”，国“弊”必然导致国危，即使是“智者”也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于是，孙子得出的结论是：“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只听说过用兵打仗有用笨办法求速胜速决的，但从来没见过用巧办法求持久作战的，战争久拖不决而对国家有利的情形，亘古亘今从未有过。对此，邓廷罗注曰：“甚言兵之不可久也”<sup>[12]48</sup>。邓公此注深切孙子真意，非“久”观点鲜明，否“久”态度坚决，戒“久”方略彰显，其核心主题只有一个：坚决反对“兵久”。总而言之，《孙子兵法·作战篇》的上半部分，孙子以尽陈“兵久”之害，从反面有力地说明了兴师致战的根本戒律：“不贵久”。

中间部分，基于“利害”之观，确立了研究战争的科学方法：“知害利”。如果说趋利避害是战争行动的根本法则，那么尽知利害就是研究和指导战争的不二法门。为此，孙子言简意赅地指出：“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在孙子看来，首先，用兵打仗是福祸相依、利害相随的。战争是把利害交融的双刃剑，在给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又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损耗，所以，既要了解它的害处，也要了解它的益处。其次，在“知害”与“知利”之间，“知害”是在先的，“知利”是在后的。诚如施子美之注曰：“贪其利，则蔽其害；思其害，则得其利。”<sup>[12]49</sup>意思就是，先见利，则易受害；先知害，则得其利，二者顺序不可颠倒。再次，“害”与“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知害”的目的在于避之戒之，“知利”的目的在于趋之往之。言下之意，只要采取正确的方法策略，是完全可以做到知害以戒、知利以往，最终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的。正基于此，孙子才说，不完全了解用兵打仗危害的战争指导者，也就不能完全了解用兵打仗的利益所在。

这是《孙子兵法·作战篇》的中间部分，虽仅此一言，但从内容上看，“知害利”乃孙子提出的研究和确立战争指导的科学方法；而从结构上看，“知利害”则是全篇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在此，他巧妙地运用了一个“故……则……”的句式结构，“故”字表明，“尽知用兵之害”句乃是上文所述之结果，是对全篇上半部分内容的承接：

“兵之害”在“久”；“则”字说明，“尽知用兵之利”句乃下文所述之缘由，是对全篇下半部分内容的引发：“兵之利”在“胜”。不言而喻，用兵打仗的最高准则——“兵贵胜”，依稀可见，呼之欲出。

下半部分，着眼“胜敌”之利，揭示了用兵打仗的至简大道：“兵贵胜”。中间部分表明，就方法论而言，利与害是相互联系、相生相克的，利中伏害，害中隐利；就对策论而言，战争的利益是从害处着眼研究并获取的，利由害现，害由利解。具体言之，上文详论“兵久”之害，旨在知“兵之害”而避之戒之；下文将论“兵胜”之利，旨在知“兵之利”而趋之往之。因此，犹桴鼓之相应，针对在上半部分分析得出的“兵久”之害：军之“钝兵挫锐”、国之“屈力殫货”，孙子在下半部分提出了两条具有极强针对性的应对之策。

一是“因粮于敌”之策。他指出：“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役力不征两次，粮食不运三回，装备器材从国内携取，粮草则从敌国掳掠，这样，军队粮秣供给就可以满足了。事实上，这是孙子针对“兵久”对国力的巨大消耗，即所谓“屈力殫货”，而提出的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限定战争投入，节其流；一为“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劫掠战争补给，开其源。为了说明这一策略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孙子再从“害”与“利”两个方面展开了全面而具体的论述。

一方面，孙子阐述了“远输贵卖”之害，充分说明了“因粮于敌”之策的必要性。他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屈力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冑矢弓，戟盾矛櫓，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关于“远输”，杜牧注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此言粟重物，轻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则农夫耕牛，俱失南亩，故百姓不得不贫也”<sup>[7]32</sup>。国家在远征讨伐之际，由于前方后方千里之遥，运输补给困难，造成国家大量的人力、畜力和财力消耗于输途旷野，所以，导致国内农田荒废，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可见，维持战争补给的“远输”，是导致国家基本经济体

“百姓”的财力“十去其七”而近乎枯竭的一个主要原因。关于“贵卖”，曹操注曰：“军行已出界，近师者贪财，皆贵卖，则百姓虚竭也”<sup>[7]32</sup>。意思是军队出境在国外，驻地附近地区人们因贪财而“贵卖”。王皙注曰：“近市则物腾贵”，施子美从之注曰：“师市之所聚，其人为众，物价腾涌，不得不贵，贵则百姓亦费”，意思是军队驻地附近会设军市，因人众聚集而物价飞涨。在孙子时代是否因“师”而设“市”今天已无从稽考，但到了战国时期，因战事而设军市的史实确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如《战国策·齐策五》讲：“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士人听闻战事，输送自家财物以丰富军市，用美味佳肴款待赴死之士。无论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军队驻地附近物价高涨是不争的事实。“贵卖”是造成“公家”费用“十去其六”，被迫“急于丘役”，进而动摇国家经济根本的重要原因。总之，孙子以“远输贵卖”之害告诉人们，只有采取“因粮于敌”的策略，才能有效纾解战争造成的“屈力殫货”之困。

另一方面，孙子指明了“务食于敌”之利，充分说明了“因粮于敌”之策的科学性。他指出：“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蓐秆一石，当吾二十石。”那么，孙子为什么认为以“务食于敌”解决战争补给问题，其效益是1:20呢？对此，曹操注曰：“转输之法，费二十石得一石”<sup>[7]34</sup>。至于何为“转输之法”，曹公语焉不详。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1:20的巨大效益的基本原理在于：我输送十钟粮、十石草至前线，经路途耗费，前方部队大约只能得到一钟粮、一石草，其效费比约为1:10。诚如孙子《用间篇》所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如果按一家出一个役夫保障前线作战的话，前方10万人作战，后方就要有70万人搞运输，一人前方作战就得有七人保障前线供给，前方一人吃粮后方七人也得吃粮，加之人畜舟车、路途险阻的消耗，运十至一的比例当属客观。敌方亦然。而当我采取“务食于敌”的策略，我得一而敌失一，其成效恰为自己输送的两倍，因此，孙子得出“务食于敌”的效费比为1:20。真可谓，一方面极大地减少己方消耗，另一方面又使敌方蒙受损失，双重收获，利莫大焉。总之，孙子以

“务食于敌”之利告诉人们,“因粮于敌”不仅是有效避免“远输贵卖”之困的足食养军之策,同时也是破解“屈力殫货”之忧的高效可行之法。

二是“胜敌益强”之策。他指出:“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要而言之,此乃孙子针对“兵久”对军力的巨大消耗,即所谓“钝兵挫锐”,提出的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此,孙子从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因因相袭,阐明了“胜敌益强”的思想方法。首先,揭示了“杀敌取利”的将士奋勇之理。杀敌因怒,取利因货,这是战场上将士心理和行为的一般价值取向,言下之意,建立制度,激之以怒,励之以货,势在必行。其次,确立了“赏其先得”的奖赏激励之制。“战车”既是春秋时期国家强大与否的重大表征,也是军队战斗力强弱与否的有力支撑。故“赏其先得者”明确阐扬了表彰先进、激励后进的奖赏手法;而“更其旌旗”则清楚说明了就地补给的可行门径。最后,提出了“乘之养之”的战力补充之法。“车杂而乘之”,缴获敌车,混编使用,辖制防变,解决战场装备补充问题;“卒善而养之”,俘获敌人,优待供养,化敌为我,解决战场人员补充问题。总之,依杀敌取货之理,立奖惩激励之制,行化敌为我之法,相因相生,压茬递进,互为整体,故孙子总名之为“是谓胜敌而益强”,这就叫所谓的愈胜敌愈强己。

对于“胜敌益强”,李零曾说:“粮食就地补充,武器就地补充,兵员就地补充。这三条加起来,就是所谓‘胜敌而益强’”<sup>[17]76</sup>。在此,李注一股脑地将“因粮于敌”亦纳入“胜敌益强”的范畴,显然与孙子的本意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孙子说得非常清楚,“车杂而乘之”与“卒善而养之”共同构成“胜敌益强”的基本内容。故此,古如张预注曰:“胜其敌,而获其车与卒,既为我用,则是增己之强”<sup>[7]37</sup>,今有施子美注曰:“盖吾本强也,今克敌而得其车与卒,吾之势为愈振矣。故曰:是谓胜敌而益强”<sup>[12]62</sup>。现代军事理论也认为,军队战斗力由人、武器、人与武器相结合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孙子“车杂而乘之”即指将缴获的敌军装备为我所用,“卒善而养之”即指俘获的敌军人员化敌为我,这种人与武器的由敌

向我的转变,正恰是促使军队战斗力提升的两大根本要素。由此可见,在孙子看来,只有得敌车与卒、用敌车与卒,换今天的话来讲,只有获得并使用有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人与武器,才叫“胜敌益强”,否则非是。

在此,刘邦骥独具慧眼注曰:“此又总结上文善用兵者之效果,皆胜之利,非久之利也”<sup>[12]62</sup>。刘注是说,从前文的“善用兵者,役不再籍”至此处“是谓胜敌而益强”,亦即《孙子兵法·作战篇》的下半部分,都是在讲“胜之利”,而并非“久之利”。事实上,以上我们之所以辨析“胜敌益强”的准确内涵,目的也就在于充分说明,孙子在下半部分着重论述的正是“胜之利”,有两点:一可“因粮于敌”,二可“胜敌益强”,前者说的是有利于维持战斗力的保障问题,后者说的是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补充问题,孙子所以分而论之,旨在阐释说明,“因粮于敌”之法,可纾“屈力殫货”之困;“胜敌益强”之策,可解“钝兵挫锐”之害。但有一点尤需我们洞见与深知,孙子提出的“因粮于敌”之法也好,“胜敌益强”之策也罢,无一不是以“胜”为根本前提,所以说,孙子下半部分实则论述了一条举师致战的至简大道:“兵贵胜”。

刘勰《文心雕龙·原理》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sup>[22]</sup>正因古人把纸上文章视为人对天地文章的参悟,正所谓乾坤妙趣、天地文章,所以在古代诸多的典籍之中往往呈现出类乎阴阳对立、两极共构的逻辑结构法则。综观《孙子兵法·作战篇》全篇,在上半部分,孙子详述了“兵之害”在“久”:一为“屈力殫货”,二为“钝兵挫锐”,有力证明了“不贵久”。在中间部分,孙子确立了“知利害”是认识和指导战争的思想方法,以知“兵之害”承接上文“兵久”之害,以知“兵之利”启发下文“兵胜”之利。在下半部分,孙子提出了“兵之利”在“胜”:一可“因粮于敌”,二可“胜敌益强”,充分说明了“兵贵胜”。令人击节叹赏的是,孙子在字里行间已然悄无声息地表明了“兵久”之害与“兵胜”之利,利害相对、相反相成的内在联系:“因粮于敌”可消“屈力殫货”之忧;“胜敌益强”可除“钝兵挫锐”之患,由此进而也理所当然地达成了“兵贵胜”与“不贵久”两种思想

在对立中共构、在互殊中相通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

### 三、速决与持久：两种战略的互证

正是基于对“久之害”与“胜之利”的深刻认知与揭示，孙子给出的结论堪称要言妙道：“兵贵胜，不贵久”，精切收束全篇旨归。在此，必须申明的是，在古今绝大多数注家看来，解决“兵久”之害的办法只有“速胜”，故在训释“兵贵胜”的“胜”时，都极力赋予“胜”以“速”的含义。古如张预注曰：“久则师老财竭，易以生变，故但贵其速胜疾归。”<sup>[7]37</sup>今如杨丙安甚至认为：“‘胜’字当为‘速’，未可以胜败之‘胜’解之，否则无义，且上下失应。”<sup>[6]32</sup>事实上，在孙子这里，“速”就是速，“胜”就是胜，二者绝无内涵上的重叠与混淆。进而言之，孙子并没有否定“速”，因为“速”本身就是“不贵久”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同时可以肯定的是，孙子认为解决“兵久”之害的根本方法，在“胜”而不在“速”，因为只有“胜”之利才能减杀“兵久”带来的一切“久”之害，这也正是《孙子兵法·作战篇》全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在孙子看来，对于一场战争而言，“速”与“久”只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所以他仅以“拙速”言及“速”的问题，而始终未提“速胜”，更未像后世兵家一样讲“兵贵速”甚或“兵贵神速”。究其根由，孙子定然深知战争“速胜”有度，往往是“欲速则不达”，因此，孙子文中才只讲“拙速”，且仅一言，再无赘述。熟读玩味，“拙”就是“笨”，假使我们将“拙速”直接说成“笨速”，会感到“拙”甚至有“慢”的意思，或许这也正是孙子所要表达的思想意蕴，由此可见孙子对于“速胜”的审慎态度。要言之，孙子“兵贵胜，不贵久”旨在强调，用兵打仗重在夺取胜利，而不在于比拼持久。这里，“胜”讲的是战争目的，“久”讲的是战争过程，这就像拔河比赛一样，战争过程中相持拉锯不可避免，有时比的就是双方的耐力和持久力，但比持久力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取胜才是最终的目的。更何况，在孙子看来，争取胜利的本身就是保持战争持久能力的最佳方法。

如若遵从本篇主旨，论证并最终提出战争的指导思想——“兵贵胜，不贵久”，就已经应当是

全文的归束和结尾，然而孙子在此却多申一言特别指出：“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并以此作为全篇的结尾。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它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与全文主旨又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呢？我们不妨再次综述全文，探寻一下孙子制作战策的理论思维与思想内容。从《孙子兵法·作战篇》全篇来看，孙子确立战争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就军事问题谈军事问题的。一方面，他以战争消耗甚巨为逻辑起点，说明“兵久”之害，于军“钝兵挫锐”，于国“屈力殫货”，最终还可能导致“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亡国灭种之灾。另一方面，针对“兵久”之害，着眼“兵胜”之利，他提出以“因粮于敌”力避国之“屈力殫货”，以“胜敌益强”力免军之“钝兵挫锐”。最后，基于“胜之利”可解“久之害”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逻辑关系，确立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战争指导思想。由是观之，孙子为战争确立指导思想，是在充分考虑国力、军力和民生等因素的基础上制定的，无处不体现出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战争与民生的关系。正如邓廷罗所注：“知兵之将，不曰三军司命，而曰民之司命，盖军兴者，国之大事，无一不取办于民。假使师劳财匮，民何以堪，苟为将而不以民命为重，何足以言知兵。”<sup>[12]64</sup>如果一个将领不知国、不知民，又何以言知兵呢？因此，孙子此言旨在为战略方针制定者和战争指导者确立一种宏阔战略视野——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安危，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以高于军事、超越战争的大视角，为战争研究和确立指导思想，唯此才能制定出利国、利民、利战的战争方略。

对于孙子确立的“兵贵胜，不贵久”的战争指导，陈启天则注曰：“本篇所谓贵胜不贵久者，盖专就攻势战争言之。若夫守势战争，乃出于不得已而应战者，必须久而后能胜，未可轻于速战速决，适中敌人之计”<sup>[12]63</sup>。陈之注可谓深中肯綮，《孙子兵法·作战篇》所提出的战争指导，的确集中反映了春秋霸政所推崇的“王霸之兵”<sup>[2]210</sup>的攻势战争指导；对于守势战争而言，其战略指导者自当另辟蹊径、别树一帜。对于这一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堪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榜样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研究、认识和

指导抗日战争的经典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认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因此,战争呈现出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四个明显特点。这其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野蛮性和退步性,决定了它小国战争潜力缺乏的劣势不可克服,在国际社会上将越来越孤立,它的强大只是暂时的,随着战争的发展,它将逐步由强变弱;而中国进行战争的反侵略性、正义性和进步性,决定了它大国战争潜力将逐步发挥出来,在国际社会上将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随着战争的发展,它将逐步由弱变强。因此,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然而,由于敌我强弱存在着巨大悬殊,这也决定了这种强弱变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抗日战争必将是持久的,而且呈现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的三个阶段。在上述研究和认识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抗日战争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其具体内涵为战略上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

综上所述,孙子强调的“兵贵胜,不贵久”,完全基于攻势战争;而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战争是持久作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完全基于防御战争。如果我们站在军事哲学的理论高度来看,这不过是对一场战争认识的两个不同方面,侵略的、进攻的、强大的一方往往采取速决的方针;反侵略的、防御的、弱小的一方往往采取持久的方针。对此,还是毛泽东的认识最精辟最深刻,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sup>[23][173]</sup>战争指导思想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客观反映,必然也随着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作为战争指导者,身系战争胜负、民族兴衰、国家存亡,必

当谨记之、慎思之、笃行之。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sup>[24][236]</sup>知其世,识其人,方可解其文。从政治方面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政治的工具。孙子生活在春秋时代末期,这是一个诸侯问鼎、王霸迭兴的霸政时代,因此,它所孕育的战争就是一场又一场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图强争霸的战争,作为一部致力于襄助吴王称霸的兵书战策,这本质上决定了《孙子兵法》阐扬“王霸之兵”的攻势战争的军事思想底色。从经济方面看,土地是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构成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物质基础,因此,土地政策的好坏决定着经济制度的优劣,进而也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强弱,这客观上规定了《孙子兵法》主张“为胜败之政”的先胜后战的战略战术基调。从军事方面看,由于当时正处于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因此,“丘牛大车”的生产力水平也就决定了平时“寓兵于农”、战时“算地出卒”的军事组织形态。换言之,国家的军事实力或战争力量基本藏集于综合国力之中,这实际上确定了《孙子兵法》基于“合军聚众”的临战建军的用兵打仗根底。倘若我们能够沉浸于春秋社会的历史环境之中,便不难找准和把握《孙子兵法·作战篇》研究与确立战争指导的两个基点:一是把攻势战争作为其制作战策的基本着眼点,二是把经济基础作为其兴师致战的根本立足点。古今注家之所以认为孙子该篇的主旨是论战备、军事后勤或战争投入与消耗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忽略了或者说颠倒了战争服务于政治、经济服务于战争的逻辑关系。所以,笔者认为,孙子正是紧紧围绕攻势战争和战争经济这两个基本问题,在充分杂于利害的基础上,才确立起“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方针的,而战争耗费或战争经济问题不过是孙子研究和指导战争问题的实践根据或者说理论逻辑起点。

#### 参考文献:

- [1]吴九龙. 孙子校释[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 [2]章炳麟. 文学说例[M]//舒芜,陈迥冬,周绍良,等. 中国近代文论选: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3]刘熙载. 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全军军事术语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 [5]老子[M]. 饶尚宽,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
- [6]杨丙安. 孙子会笺[M].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 [7]杨丙安. 十一家注孙子[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8]黄朴民. 孙子兵法解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 [9]吴如嵩. 孙子兵法十五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0]付朝. 孙子兵法结构研究[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0.
- [11]赵本学. 赵注孙子十三篇[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2]任庭光,李卫国. 孙子兵法汇解[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3.
- [13]论语[M]. 陈晓芬,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4]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章学诚. 文史通义[M]. 罗炳良,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6]司马迁. 史记[M]. 文天泽,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7]李零. 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战争哲学[M]. 北京:三联书店,2010.
- [18]钮国平. 孙子详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19]杨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20]李零. 吴孙子发微[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1]杨宽. 战国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2]刘勰. 文心雕龙[M]. 王志彬,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3]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1[M]. 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4]孟子[M]. 万丽华,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A Study on the Gist of Waging War Chapter of *The Art of War*

QI Zeqiang

(PLA Army Academy of Artillery and Air Defense, Zhengzhou 450052, China)

**Abstract:** Regarding *Waging War Chapter of The Art of War*, since Cao Cao annotated its title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later annotator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calculating its expenses” as its gist. However, the gist of the chapter of waging war is actually an interpret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strategic policy of “the great object of war is victory, not lengthy campaigns”. By interpreting and defining the chapter title of waging war, it can be uncovered that its original meaning and annotation is “making military strategies” or “formulating military strategies”. With following the logical path to explore its main idea, the gist of “not lengthy campaigns” in the first, “knowing the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and “the great object of war is victory” in the following has been clarified.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ly interpret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Sun Tzu’s “the great object of war is victory, not lengthy campaigns”, and reflecting on Mao Zedong’s strategic polic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s a protracted battle, and the ultimate victory is for China”, the overall and guiding nature of the military strategy established in *Waging War Chapter of The Art of War* can be proved.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Waging War Chapter*; strategic policy; the great object of war is victory; the great object of war is not lengthy campaigns

(责任编辑:许 金)